

20世纪

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1976-1999

回眸与沉思

第四辑

反思卷

主 编 / 柯 灵

执行主编 / 关 鸿

本辑主编 / 桂国强

 文 匯 出 版 社

(回眸与沉思)
— 18 —

责任编辑：戎思平 陈飞雪

封面装帧：陶雪华

20 世纪中国纪实文学文库

第四辑(1976—1999)

回眸与沉思

反思卷

主编 柯 灵

执行主编 肖关鸿 本辑主编 桂国强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80000

印数: 1—10000 印张: 17.5

ISBN7-80531-583-3/I·73

定价: 26.00 元

前 言

纪实文学是一个民族为自己建造的纪念碑。它真实地记录了民族的盛衰强弱荣辱兴亡。墨写的史册比任何花岗岩建筑更加永久而辉煌。

纪实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几乎与文明史一样悠久，早在公元前后两个世纪，东西方相继出现如《史记》与《希腊罗马名人传》这样的皇皇巨著。

但是，古典纪实文学中的一种主要样式传记文学的黄金时代并没有持续多久，长期的停滞一直到明清之交才出现转机。

本世纪初，纪实文学的另一种主要样式报告文学应运而生，这不仅出于急剧变化的时代的需要，而且还与近代新闻事业和机器印刷术的发展密不可分。

传记文学的复苏，报告文学的新生，中西文化交汇的激流注入的生命力，使纪实文学呈现了全新的面貌和空前的繁荣。

现代纪实文学的兴盛是历史的选择。它与20世纪中国的命运息息相连。纪实文学第一次成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同样，时代也为纪实文学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这个世纪对当代人与后继者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世纪末又将临近时，人们已

经开始从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对这个将要结束的一百年进行回顾总结。这是一个太大的题目,我们只能从某一个方面做点自己的努力。

我们选择纪实文学,首先因为还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梳理和总结,这样的尝试富有某种挑战性。

另外,纪实文学既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是文学作品中最为贴近历史贴近现实的一种样式。我们梳理纪实文学的脉络,也是梳理历史与现实的脉络。这会成为我们作世纪回眸的一种方式。

自从历史的概念被分为“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之后,人们意识到很大部分历史都是“叙述的历史”。因此,不是官方教科书,而是由亲历者根据个人经验撰写的“历史”就显得特别珍贵。这也是纪实文学的价值所在。

纪实文学留给当前的是信息,传之后世的是文献,而信息传播与文献留存的载体则是有欣赏价值的文学。我们在兼顾到这三种价值的同时偏重的是文献价值,旨在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直接观察和原始文献。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所选编的纪实文学范围除了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这两大类之外,还有纪实性散文和文学性特写。

整个20世纪纪实文学拟选编为五辑二十卷,从1996年起逐年推出,到1999年完成。这是一个颇为浩大的工程。

今年年初先推出第四辑六卷。年底将推出最后第五辑四卷。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再说陈独秀.....	麦 阳(1)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	丁 玲(15)
王实味冤案平反	温济泽(42)
共产国际压制毛泽东了吗?	青 石(59)
“抢救失足者”	韦君宜(83)
刘顺元与“旅大事件”	丁 群(97)
1950 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	青 石(113)
功臣的悲剧.....	王朝柱(129)
开国第一文化冤案.....	唐文权(202)
错误批判马寅初的前前后后.....	辛 平(215)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始末.....	戴知贤(238)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李之璠(256)
迟到的理解.....	朱学勤(277)
关于“大民主”和“小民主”一段公案.....	李慎之(286)
“阳谋”——1957	徐铸成(297)
丁酉年纪事.....	朱 正(315)
在风口上.....	纪希晨(334)
“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三次上书.....	李 锐(344)
毛泽东决定解散农村食堂的来由.....	刘秉勋(355)

记忆最深的三年·····	李克林(365)
忆 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斗争·····	萧 克(374)
庐山会议以后的严峻岁月·····	江渭清(386)
“刮单干风”与曾希圣·····	水 静(396)
农村“四清”:十年动乱的前奏曲·····	杨克现(412)
我国“两弹”研制决策过程·····	刘西尧(425)
从批“左”到批右的转折·····	王若水(445)
农村改革第一步·····	凌志军(463)
“要吃米找万里”民谣的来龙去脉·····	吴 象(493)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前前后后·····	魏新生(513)
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马立诚(538)
编后·····	(552)

麦 阳

再说陈独秀

五十年过去，世界忘记这个人了吗？似乎没有。在历史的每一个拐角，陈独秀的名字总被人们这样那样反反复复地说着。直到1979年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终于开始有了中肯的评价。此后陈独秀的墓两次扩建，立在墓前的“无字碑”，给后人留下一个再评说的机会。五十年过去，今天我们又提起他。

1942年5月13日，曾是中共一大代表的包惠僧来到四川省江津看望隐居于此的陈独秀。陈独秀正在写作《小学识字教本》，见老友来，匆匆完成笔下的“抛”字起身相迎。然而，这个抛弃的“抛”字，竟是他一生落笔的最后一个字。5月27日，陈独秀撒手而去，享年63岁。

从晚清秀才到中共总书记

1897年，18岁的安徽省安庆秀才陈独秀参加乡试落榜而归。为了却母亲心愿才进考场的他并不感到沮丧。他这样描绘清政府的考场说：“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这般的毛病。”如此出言不逊，并不出陈家的意料。早在陈独秀少年

时代，他严厉古怪的祖父就领教过小小孙儿以倔强的沉默所作的多次反抗。祖父曾断语陈独秀：“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的确不同凡响。落榜回家后，他仍痛感时势日非，心潮未平，挥笔写下七千余字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从此，竟使没中举的陈独秀的文名不胫而走，被人誉为“皖城名士”。

“皖城名士”却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作为封建社会的一名掘墓人，他的叛逆个性显露无疑。1901年至1915年，陈独秀五次浮槎东渡，留学日本，其间的传奇色彩令人瞩目。

1903年，陈独秀第二次赴日的后一年，因沙俄拒绝退出侵占的中国东北三省，中国留日学生组织了拒俄义勇军，要以尚武精神赴东北战场。但义勇军不久就应清政府请求而被日本当局解散。愤怒不已的陈独秀，相约邹容、张继等人，在一天夜里偷偷潜入清政府委派的湖北留学生监督姚文甫的寓所，由张继抱腰，邹容按头，陈独秀挥剪，剪去了从睡梦中惊醒的姚文甫头上的辫子。事后，他们被强行遣返回国。

1914年他第五次东渡日本，在江户与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在这个杂志上，他首次用“独秀”的笔名发表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又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在文章中他说：“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他堂堂然宣称这样的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不所惜！”此言一出，舆论大哗，有人诘问斥责陈独秀：“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对此，性格暴躁的陈独秀，一反常态，没有辩解，他意识到重要的不在于为一篇文章摇唇鼓舌，而是要向整个旧的传统观念开战。彻底的决裂从绝望绝情开始，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会改观！”最后一次离开日本，

成熟而充满自信的陈独秀把目光投向整个中国大地。

很少有人不知道五四时期那个思想启蒙运动的火炬——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它第一次在中国高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发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怒吼；它卷起了席卷全国的一场文学革命的狂飙。这是一个革命转型的时代，也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在新旧思潮激战中，陈独秀不屈地挺立着。

历史后来选择的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这样讲到陈独秀和《新青年》：“当我还在师范学校作学生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一种杂志，我很喜欢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早已被我厌弃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时成为了我的模范。”毛泽东说：“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其他任何人的影响都大。”

俄国十月革命炮声的余音里，五四运动昭示的曙光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新篇章。1921年，中共一大的举行，正式宣告了它的成立。

这一年，陈独秀42岁。自他乡试落第以来，二十四春秋已逝。星转斗移，换了人间。他不再是面对信仰奋斗的职业革命家；他不再是安庆乡间的秀才，而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总书记。历经磨砺，陈独秀终于走向政治生涯的光辉顶点。1921年至1927年，中共先后召开过五次党的代表大会，无论他是否出席，都无一例外地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或中央执委会委员长）。

然而这一辉煌仅延续了七年时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他被停职，从此开始不甘寂寞却举步维艰的十五年人生跋涉。

大浪淘沙。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走出了书斋，肩负起具体指导现实斗争的重任。相伴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党内争论。方向明确了，却没有一条现成的路可循。

陈独秀的倔强个性在党内有口皆碑。大革命未起，他就首先

起来反对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的国共两方“党内合作”的办法。争吵很激烈，结果是陈独秀终于不情愿地接受了在共产国际组织纪律约束下实现国共“党内合作”的决定，马林也认可了陈独秀提出的首先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的建议。

争论暂时结束。但马林恐怕不会忘记陈独秀拍着桌子对他说的话：“各国革命有各国情况。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

如此看来，陈独秀并不缺少独立性，可是为什么他会在以后国民党右派的步步紧逼之下表现出软弱、妥协和退让呢？

1925年底，谢持、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叫嚣“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党籍”，陈独秀不但不组织反击，反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遭否决后，又提出“退而不出，办而不包”的方针，放弃争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

得寸进尺的国民党右派又在1926年3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接着抛出的《整理党务案》也为陈独秀接受，致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利进一步丧失。

1926年，陈独秀力主对潮水般起来的农民运动实行种种限制，损伤了属于自己阵营的工农群众的力量。

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既起，陈独秀却继续推行依靠汪精卫限制蒋介石的错误方针，结果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挥起屠刀“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

种种表现，我们不难从他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和社会各阶级》文章中找到答案，这就是著名的“二次革命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既然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么它只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

产阶级从中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等着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以后，无产阶级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的理论指导，除 1927 年的结局之外，还能把革命推向哪里？如此结局，作为总书记的陈独秀是难卸责任的，而对于刚刚成立七个年头，理论上、政治上还都稚嫩的中国国民党又意味着什么？如果说国共两党阶级利益不同，分道扬镳势在必行，那么会有和平些的最后一幕吗？

这是党史专家们的课题了。何况历史不能“如果”。不论人们今天如何说长道短，事情是这样发展的：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停职，继而组成了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等人的中共临时中央委员会。血雨腥风之中，陈独秀隐蔽在武汉工人住宅。正当他沉默不语，苦苦思索之时，“八七”会议的决议传来，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土地革命新时期开始了。

陈独秀几次拒绝接受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要求，他要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中国革命问题。然而思考的结果，却是他一步步走向托派的歧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

陈独秀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这是千真万确的。但由谁来领导，又走哪一条路呢？能选择的只有历史。一代伟人就这样在革命的漩涡中被抛甩了出来，渐渐远离奔涌向前的时代洪流。

政治家还是学者？

“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是政治家陈独秀的一句名言，也是他生活的写照。

陈独秀先后被捕过四次，前三次由于社会各界的营救很快获释。令他饱尝铁窗生活的是1932年的那一次被捕。

10月19日，陈独秀被连夜押往南京。京沪列车上，他酣睡达旦，以至车到南京还没醒来。陈独秀面临被处决危险的泰然与安详，一时传为佳话。

后来，传来了把陈独秀转送江苏高等法院公开审判的消息，蔡元培、胡适等纷纷向他推荐辩护律师。陈独秀没有钱请律师，章士钊自告奋勇义务服务。他们是“五四”以前的挚友，后来在政治主张、文学体裁方面打过笔仗。章当时为闻名全国的大律师，不取分文酬劳，被人称誉为“有古义士之风”。

临审前，一些竭力想营救陈独秀的人数次帮他改供词，陈独秀签字又数次改回去。

开庭之日，旁听席挤满人群。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被起诉的陈独秀自撰辩诉状，慷慨陈辞，洋洋千言不止，证明犯有“危害民国”和“叛国”的不是自己，而是国民党政府，博得人群喝彩。章士钊的辩护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当他讲到陈先生是站在三民主义立场上言行并不违法时，忽见陈独秀拍案而起，声明：“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令章士钊不知说什么才好。此语既出，法庭哗然，旁听席上传来“革命家”、“革命家”的赞声。然而，尽管陈、章的辩护名重一时，陈独秀还是被判了十三年徒刑。

我们且不说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如何，如此的光明磊落所表现的又是怎样的勇气？

鲁迅对陈独秀有这样的描述：“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这种韬略在陈独秀一生中随处可见。

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较安定的教授生活，他的大部分时光都在颠沛流离、险象环生中度过。对此命运，“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是他的回答。他像一匹不羁的马，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他奋力向自己执着的目标驰去。

陈独秀不缺乏政治家的勇气。但倔强执拗、我行我素却把他推到了政治舞台的死角。抗战以后，他脱离了托派，但又始终不接受中共中央的条件作一个公开的声明。他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善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绝对不怕孤立。”

但是，孤立，难道不是政治家的末路吗？

虽然陈独秀在孤立的困境中依然关心政治，然而他所能做的也只是他的学问了。他本来就是一个学者，他的学问做得和他的人一样有棱有角。

他懂日、英、法三国文字，工宋诗，写隶书，学贯中西。不仅旧学有根底，新学也有造诣。

陈独秀最有成就的还是文字学和音韵学。《干支为字母说》、《实庵字说》、《识字初除非》、《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连语类编》、《荀子韵表及考释》等著作都有独到见地，可谓广征博引，丝丝入扣。他认为从文字的形成和发展，可以看到社会和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而他所做的，就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探索一条文字学的道路。

被捕后，陈独秀把研究室搬进了监狱。一次，江苏南通一位程老先生慕名到狱中探望。两人相见互道钦佩，客气有加，不料谈到中国文字中的“文”字，竟争吵起来。

陈独秀说：“‘文’字明明是画着一个人以手执杖指挥家人行事。”程老先生说：“‘文’字明明是捧着一盆火，教人炊饭。”

一个说：“你不通！”另一个则说：“你不通！”

这边马上斥之：“你浅薄！”那边也不示弱：“你浅薄！”直吵得面红耳赤，拍案大骂，差点动起手来。

事后，两人又和好。临行陈独秀还给罗家伦写信，要推荐程到中央大学教文史。

程老先生最终没教成课，陈独秀依然坐他的牢，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被释放。

他是政治家还是学者？抑或兼而有之，抑或两者都不彻底？如果陈独秀不涉足政治，他会是一名大学问家吗？他思想的智慧是不是多于是他政治的谋略？现成的答案仍然没有。

情归何处：四次婚恋

1897年冬的一天，安庆市陈家大院张灯结彩，正办喜事。烫金双喜灯笼映照得大门两侧“乾坤谐好”“鸾凤和鸣”的对联格外醒目。客来人往，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陈独秀对此充耳不闻，想像着即将娶进门的新娘，不由添了几分惆怅、迷惘。新娘高晓岚是安庆营统领高登科之女，城内数得上的大家闺秀。这门亲事深得两家欢心，然而对于自己有何意义呢？他无法阻止，只得木偶般任人摆布。

眉清目秀、身材修长的高晓岚却满心欢喜，庆幸自己择到了如意郎君。她生在显贵人家，却丝毫没有骄横之气；她目不识丁，却决心恪守妇道，孝敬公婆，体贴丈夫，不负乡中“夫贵妻贤”的美名。

一对夫妻两样心情。陈独秀感到与高晓岚思想“相隔不止一世纪”。年复一年，这种隔膜愈深。他几次劝她多学文化，她不屑

一顾：“夫主外，妻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他把自己的得意之作讲给她听，她柔言轻语地说：“夫君之言，为妻懂之甚少，不必再为难妻了。我会伴君安分度日，上待父母尽心尽力，下做贤妻生儿育女。”高晓岚想不通为什么一个文采飞扬的白面书生要去做那会招来抄家灭族的事情？

直到今天，我们也无法指责这位旧式女子什么。她心地善良，辛勤持家。一身老蓝布做成的长长的大褂是她一年四季不变的装束，宽大裤脚管系得紧紧的。她从不表露对丈夫的不满，也从来没为自己考虑过什么。

而对陈独秀，我们又能责怪他什么呢？须知，这是一个新旧时代交替的裂变期呵。

在陈独秀、高晓岚婚姻岌岌可危的时候，高君曼出现了。她是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迥然不同的是，她思想敏捷新颖，谈吐大方，热情奔放，特别推崇陈独秀的文章和为人。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每逢寒暑假，总要以探望姐姐为名，与陈独秀相伴攀谈。两人相处日渐密切，时而漫步乡间小路，时而书房促膝谈心。她的到来，使陈独秀如沐春风。

而这一切，对高晓岚来说，她所能做的只是躲在房中暗自垂泪。她的眼泪，陈、高两家的严厉指责和乡中的风言风语，却没能阻止丈夫和妹妹俩我行我素，直到毫不顾忌地私奔。陈独秀与高君曼先至日本，后在杭州同居，并于1910年春西子湖畔正式宣布结为伉俪。从此，陈独秀与高晓岚十三年的婚姻名存实亡。

倘佯湖山之中，夫唱妇随，两情缱绻，相敬如宾。这段美好的生活令深感旧式婚姻之苦的陈独秀恍如梦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陈独秀出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与高君曼一起回到安庆，住在离陈家不远的宣家花园。风波并没有过去。陈、高两家始终不承认他们的关系。高家认为姐妹同嫁一人，礼教不容，把君曼逐

出不认为女；陈家则视这种婚姻为败坏门风，有损祖宗荣光，比陈独秀参加革命更难容忍，不许他们踏入家门。一片指责声中，唯有高晓岚沉默不语。

风风雨雨十六年过去，这段很新式的婚姻还是触礁。1925年10月，高君曼带着孩子离开了陈独秀，孤身定居北京东厂街他们在讨伐袁世凯失败后购置的房屋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陈独秀。

高晓岚1930年9月9日病逝在安庆老家。也已离开陈独秀的高君曼带着孩子为姐姐奔丧，在陈家住了一年多，陈家的人直到此时仍耿耿于怀。陈独秀姐姐的孩子称高君曼为“小姨”，这使高君曼心里很不舒服，她说：“叫我小姨当然可以，但对他们舅舅（指陈独秀）如何称呼？难道也叫姨父吗？”

一年之后，高君曼因子宫癌也去世了。姐妹俩情系一人，至死无怨无悔。高晓岚嫁到陈家三十三年，没有得到过陈独秀的爱情；而高君曼虽争取到了自己的一份幸福，最后却也和姐姐一样，独自啜饮着人生的苦酒。

离开高家姐妹，漂泊在外的陈独秀又先后经历了两次婚恋。

大约1926年1月初，陈独秀突然没了踪影。焦急万分的同事们不得已用化名登广告寻找，仍无线索。一时众说纷纭，猜测四起。国民党右派造谣说陈独秀“是到武汉勾结北洋军阀吴佩孚以破坏北伐革命”去了，中共中央则对此专门撰文坚决驳斥。正当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到因陈独秀失踪中央机关是否需要迁移的议程时，忽然接到了陈独秀从上海来的消息，原来他因伤寒住进医院了。后来人们又了解到照料他的有一位不知名的女伴。

这位女伴是谁？60年后，由于这位女伴的养女的出现才使事情真相大白。她叫施芝英，是个未婚医生，在陈独秀住院期间因崇拜而生爱恋，由爱恋而同居，直至1927年3月才分手。施芝英

是陈独秀四个女伴中唯一活到解放以后的人。他们生活得如何？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她对此一直缄口不言，直至1973年病故，这些谜仍然没能解开。

1930年下半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陈独秀遇到了生活中最后一位女性——潘兰珍。她出身在工人家庭，那时才二十多岁。他们的相识是因为同在上海熙华路一座石库门楼房居住，隔门相望，开门相见。陈独秀因躲避通缉，隐名埋姓在家写作，起居无人照料，生活艰难。善良的潘兰珍时常过来帮助自己十分崇敬的学识渊博的老先生。一来二去，两人同进同出，虽然年龄悬殊近三十岁，他们还是闪电般同居了。潘兰珍忠厚朴实，一直称陈独秀为李老先生。她从不打听他的去向往来，只是悉心照顾他的饮食起居，相处十分融洽。潘兰珍对陈独秀一年几次搬家的异常举动毫不疑心，如果不是陈独秀被捕，她恐怕永远不会知道李老先生竟是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1932年陈独秀被捕，消息被大小报纸竞相登载。“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匪首陈独秀”的大标题下赫然登着照片。那一天，潘兰珍因和陈独秀赌气正在浦东娘家，看到报纸惊叫起来，如梦初醒：“这不是我家李老先生吗？”

识破李先生真面目，潘兰珍毫不犹豫地赶到看守所，得知陈独秀已被押南京后，又辞去工作，打点行装赶去。她不避“共匪首领”之嫌，决心一辈子陪伴陈独秀，共度患难岁月。

陈独秀得知潘兰珍的心愿，感动得老泪纵横。这样一个普通女子，竟是自己晚年的知己，实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他写信给友人要他劝止潘兰珍，无奈潘兰珍早已心坚似铁。就这样，她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间房子，每天早出晚归，尽心照料陈独秀，在物质和精神上都给了陈独秀很大的帮助和安慰，使他能以病弱之躯安然度过五年狱中生活。